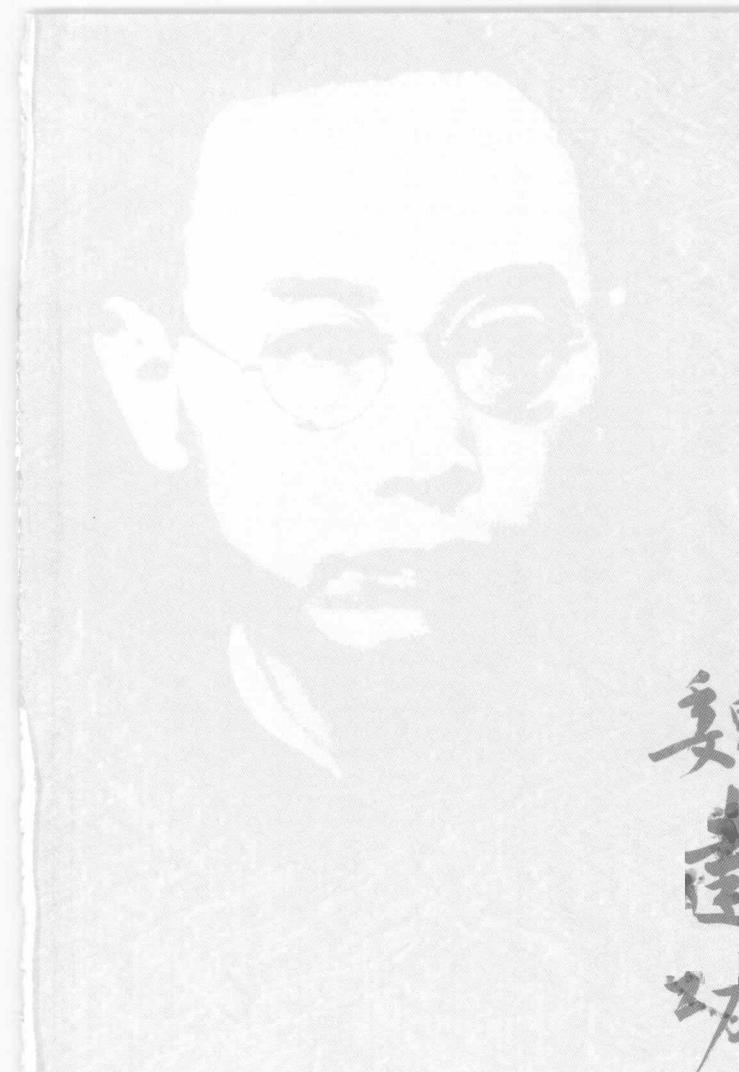


# 一代宗师

## 魏建功



◎ 马嘶著



一代宗師

魏達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代宗师魏建功/马嘶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5039 - 3173 - 4

I. —... II. 马... III. 魏建功 (1901 ~ 1980) —  
传记 IV. K8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630 号

**一代宗师魏建功**

著 者 马 嘶

责任编辑 向 宏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http://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mailto: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 - 5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173 - 4/I · 1491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数千年间，孕育出了数不尽的智慧精英、文化巨匠，在华夏文明史上荟萃连缀而成一幅绵延无尽、令后人眼花缭乱的杰出人物画卷。而这些身上每一个细胞都被传统文化浸泡过的智者，又无时无刻不在按着良性循环的铁的必然规律，维护、哺育、推动着这古老文化传统的不断发展、完美、更新。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一个固有文化未曾中断、摧折、灭绝的国家。

这一切似乎是在不知不觉间顺乎自然地进行着。许多个朝代的更迭，无数战乱的发生，构成了漫长的历史。这期间，社会屡受挫折、重创乃至倒退，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总是在进步着、强大着、完美着、精粹着。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视文化为仇敌的君主和作乱者，他们曾经恣意摧残过前人创造的灿烂文化，却又终未能撼动她那粗茁的根，待到春归大地，她又长出茂密的枝叶，开出绚丽的花朵。

中国历史上，屡有一些清醒的饱学之士，在不同的时期产生过超前意识，试图对本土文化精神进行一番总结、反思，以探索更快的发展之途。这期间，便有“儒学”、“汉学”、“理学”、“朴学”之类的命题被提出，并且相应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但这似乎都是在一种心平气和的精神状态之下，对自己涵泳其间的固有文化母体上或是标新立异、或是立志改革的一种努力尝试。他们既没有丧失怙恃的哀痛之情，又不曾产生过亡文丢种之恨，因而他们的努力是饶有兴味、舒畅为之的。

然而，到了19世纪的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重门深锁的中国国门，另一个半球的海洋季风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即所谓“西学东渐”之时，中国便出现了“国学”这个称谓。“国学”，显然是针对“西学”而言，其立意似乎并不是单一的，它既有捍卫本土文化、使之独立于“西学”而发展的积极意义，又有拒绝吸纳西方文化保持单一民族文化的保守意味，不过，归根结底它具有了爱国主义的沉重内容。如



果说，唐代的玄奘法师历经 17 载，行程 5 万里，去印度取回佛教经典，由梵文译出大乘经论 75 部 1335 卷，是为了吸收佛教发源地的异域佛教文化，以发展本国的佛教文化，从而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全盛时代，那完全是一种自觉的积极行动，虽历尽艰辛却视为甘饴。而在清朝末年中国将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之时，一些先进的士子提出了“国学”这个命题，便带有了深切的痛苦和强烈的自卫之意。而由此衍生出的“国学大师”也便成了受人尊崇敬仰的称谓。就像古圣先贤那样，头上笼罩着令人艳羡的光环。而这个称谓的出现并被人们所认同，则已到了 20 世纪初年了。

1905 年初，邓实、黄节等人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2 月间，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打出了“保种、爱国、存学”的旗号。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一批中坚人物，皆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他们便被称之为“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胡朴安等便是最早一批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人。

国学大师多出现于 20 世纪上半叶，以前，这些人是被称为“儒学大师”、“经学大师”、“汉学大师”、“朴学大师”的。“国学大师”的称谓实是很短命的，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人民政权取代了反动官僚统治之后，在中国大陆，如同对以前流行的“社会学”、“先生”、“小姐”、“发财”之类的普通称谓一样，突然变得讳莫如深了。此后，“国学”很少再有人提及，“国学大师”头上的那道璀璨的光环顿时黯然失色，虽然这些稀如凤毛麟角的饱学之士依然活在世上。

关于“国学”，旧版《辞海》解释为：“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20 世纪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常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皆属于“国学”的内容。“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教授黄侃等人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他们的切近目的是反对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到了 1923 年，北大又出版了《国学季刊》，由胡适任主编，编委有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等 10 人，刊物封面由鲁迅设计、蔡元培题签。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先锋人物来主持《国学季刊》，这似乎是意味着对新文化运动中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拨和纠正，而胡适就干脆在刊物上发表鼓吹“整理国故”的文章。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

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北大《国学季刊》的出版，标志着国学研究的革新，它已同与新文化运动相抵牾的《国故》大异其趣。这不仅表现为刊物的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更重要的是，它开始采用以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国学，即向西方学习的科学方法。于是，《国学季刊》便开创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故学的新局面，从而造就了一批新的国学大师。

此前，北大研究所成立了国学门，1925年，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请来了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和当时已具备了大师条件但尚未被称为国学大师的赵元任、陈寅恪为四大导师。至此，“国学”遂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由涓涓细流发展为浩荡江河，一批年轻的国学人才脱颖而出。到了20世纪中叶，除了那些在世纪初就被人们尊为“国学大师”的前辈学者之外，又有一批可尊为“国学大师”的第二代世纪学人走上学术舞台，成为领风骚的人物。

然而不久，一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是以1949年为分界线，在明媚的春光已经到来的地方，“国学”研究倏然沉寂，那些声誉日隆的“国学大师”也便虽不情愿却也识趣地坐起了冷板凳，悄然地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紧接着，在悄然中，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个又一个大师级的国学学者被推上了祭坛，成了众目睽睽的“另类”（请恕我超前地用了这个时髦的名词）人物（或曰“入了另册”的人物），梁漱溟、沈从文、俞平伯、胡适便是最早被推出来示众的大师。特别是从1954年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那场旨在“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之后，源远流长的“国学”便几乎成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异名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此后，便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接一个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名为“发扬光大”实则是大加禁锢、挞伐的文化批判运动，这运动常常是以批判和打倒某个权威人士和其作品为载体，以至常常无限扩大，裹挟进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们“鸣鼓而攻之”，从而形成一种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并且常常是危言耸听地鼓动那些胸无点墨的人们去凶猛地批判学富五车的学者。不用说，大师们也就如“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

20世纪的国学和学人的悲剧命运便是如此。

国学和国学研究在沉寂了 40 多年之后，忽然意外地遇到了转机。90 年代初，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正当“大学教授卖馅饼”之类并非莫须有的传言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之时，从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国学”研究的发祥地北京大学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北大义无反顾地推倒了南面那条狭长的与闹市隔绝的校园围墙，开设了商业一条街。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颇多关注的北大拆墙之举，似乎有着很强的象征意味，其对中国高等教育和高深学术研究、传统意识的冲击非比寻常，对平静校园的冲击，绝不亚于 1958 年骤然兴起的开门办学和随之而来的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运动，那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受到了批判，北大也出现了由中文系 1955 级学生集体编写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后来，似乎又有人说它是“有伤国格”的一部文学史）。但是，正在北大师生处于思想观念大转变、万千学子被经济大潮奇景引得心猿意马之时，1993 年 5 月，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面世，重新亮出了岑寂已久的“国学”大旗。为此，一些业内人士不免产生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沧桑之慨。

把宁静的校园围墙推倒开设喧嚣的商业街，创办《国学研究》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北京大学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的这两种似乎代表着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的相悖事物，肯于思索的人似乎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某些关联乃至因果关系。《国学研究》主编、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笔者的同窗学友袁行霈教授在《发刊词》中写道：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也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因此，有识之士莫不疾呼弘扬我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辅助现代化事业——这实在是远见卓识。

北大有着国学研究的传统与深厚基础，20 世纪上半叶，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陈汉章、马叙伦、黄节、朱希祖、刘文典、沈兼士、梁漱溟、沈尹默、顾颉刚、钱穆等国学大师都曾在这里任教和

讲学，50年代前后，又有汤用彤、俞平伯、冯友兰、翦伯赞、魏建功、王力、朱光潜、季羡林等国学大师执教于斯。50年代被称为“国学大师”的这些人，多是在他们的前半生就已具备了大师的深厚学养和学术品格，而到年长时（有的甚至是在仙逝之后）才被拥戴上这顶桂冠，他们应该算是20世纪最后一批国学大师了。因而这些人应该特别受到社会的珍视，人们通常给他们一个通俗易懂的称呼，叫他们为“国宝”。

作为20世纪所独有的“国学大师”，他们身上深深地镌刻上了本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烙印，他们多是经历了极其坎坷的一生，比常人遭受到更多的苦难与不幸。他们所经历的太平盛世稳定生活实在太少了。经历了太多的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他们心向往之的只是与书斋共存的人生理想，但这样的理想也总是难以实现，且又多是遭逢种种失意、抑郁、屈辱、迫害乃至死于非命。由于他们应当享有的平静书斋生活实在少得可怜，因而也就大都难以倾其所学所得诉诸于个人著述的名山事业，甚至也不能自由驰骋于“述而不作”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生涯。这样，他们毕其一生兢兢业业积累起来的满腹经纶，也便只能是随着生命的凋谢而自生自灭，永无面世之日。这是国学大师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当然，也有如王力、季羡林这样一些意志如钢铁般坚强的有志之士，他们能够在身处逆境之时，在乖戾生活的夹缝中求得一点点尚可利用的光阴，锲而不舍地用于著述事业。如王力在“文革”蹲牛棚的险恶环境里竟完成了《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同源字典》三部书稿。季羡林在九死一生的“文革”后期利用在为学生宿舍看守楼房的日子里，偷偷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这部古代印度最长的史诗有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比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还要长，这实是学术史上的奇迹。

这些已逝的国学大师大抵都是带着许多未了之愿乃至是一腔悲愤离开人世的，陈寅恪、吴宓、翦伯赞等是最典型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因而，国学大师们的身后事也似乎比别人更多，也更引起人们的关注。

北大教授魏建功就是这样一位国学大师。

1980年春寒料峭季节，当封冻了整整十年之久的神州大地刚刚冰融雪化，荒芜贫瘠的文化土壤上刚刚钻出几株零丁的花草，北京大学燕南园里那久不修葺的几株老松



和几丛绿竹刚刚被人修剪、梳理了一番，从而恢复了往日的妩媚和雄姿，燕南园 63 号小院的主人魏建功便带着一身病痛、诸多怀念、无尽宿愿和半腔怨愤，离开了他多么想滞留着的这个世界。

他患的是老年性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潴留症，这多半是由于心情悒郁、气郁不舒所致。此时，他的夫人王碧书已瘫痪在床，只能坐在轮椅上走出屋子到廊下晒晒太阳，好在燕南园 63 号是个平房小院，50 年代马寅初校长住在这个小院里时，就是常常在廊下晒太阳、做体操。60 年代初，马寅初由于提出“新人口论”而遭逢不幸，他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永远离开了北大，这个小院便多年闲置了下来。当 1974 年魏建功先生从燕东园 34 号迁入这个小院时，这里已是荒秽不堪了。魏建功就随缘而适地住在这里，一年年一天天送走了日月星辰，也送走了一个个朋友和同事。

燕南园是北京大学燕园众多园林中较小的一个，她因坐落于燕园的南端而得名。园中只错落着 16 幢精致幽雅的二层小楼和平房独院建筑。她同燕园内外的朗润园、镜春园、燕东园、蔚秀园、承泽园、畅春园、中关园、燕北园一样，是北大教师宿舍区。但燕南园一直是个为学人们情之所钟之处。北大人有一句口头禅：“名教授不一定住在燕南园，但住在燕南园的必定是名教授。”而且，这里住的多是大师级的教授。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在燕南园里住过的有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冯友兰、翁独健、侯仁之、朱光潜、魏建功、王力、翦伯赞、饶毓泰、陈岱孙、郑昕、马坚、齐思和、林庚、黄子卿、冯定、褚圣麟、江泽涵、张龙翔……因而，在燕南园里，你可以找到北大的幽邃学魂和敬业精神气韵。然而，这些年中，就在这隐蔽着北大幽邃学魂、流淌着北大敬业精神气韵的园子里，死亡之神却不断降临，大师们相继离去。这些，多病的魏建功都记得很清楚，有一些人，本是在他搬进燕南园之前过世的，他也常常想起他们。

较早去世的是副校长、哲学家、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他是在 1954 年得的病，那时他还在副校长任上。有一天，他同冯友兰应邀去《人民日报》参加批判胡适的会，但是，在散会后，车子开到他的家门口，司机打开车门，他却迷瞪瞪地问：“这是到哪儿了？”他找不到自己的家。这是中风的前兆，此后，他便得了脑血栓，坐上了轮椅，10 年后便逝世了。北大人都会心照不宣地想：汤用彤的病是与批判胡适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汤用彤是胡适的好友，两个人在北大有过很好的合作，胡适任北大校长

时，每逢外出开会，常是委托汤用彤主持校政。1948年12月胡适飞离北平后，汤用彤就被推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开始后，住在燕南园51号的物理学家饶毓泰，被大字报逼得自杀身亡。住在燕南园64号的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亦于1968年12月18日因受到残酷迫害，与夫人戴叔婉双双含冤自杀。1978年6月23日，住在燕东园的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先生逝世。游国恩比魏建功大两岁，在北大国文系比魏建功晚毕业一年，算是魏建功的同窗学友和同事。此外，还有一些朋友、同事相继去世。这些，本也是很自然的，但这却使魏建功实实在在感觉到：我们确实已经老了。不过，他随即又想到：因为老了，就应该赶快干些事情，要抢时间去做……

魏建功已然小便失禁，上床和外出时老是缀着个接尿袋，很是不便。他家中没有雇保姆，子女们又不在身边，多病的魏建功只好自己去照顾病重的老伴。但做这些事并非他之所长，比起做学问，这些生活琐事似乎更使他感到困难，他生活得有些狼狈。

他自己的病也的确该去医治了，子女们已经催促了多遍，他这才决定去住院做手术。

1980年1月24日，大女儿魏乃送他进城去北医附属第一医院诊治。路上，魏建功满怀希望地说：“病治好后，我要写回忆录啦，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事，认识那么多人，写出来，便是一部现代学术史……”

听老人这样说，魏乃很是高兴：“您早就应该写，写吧！”

魏建功的脑子里闪现出了十年浩劫中发生的那些事，那样的事发生得太多了，他记也记不清。许多个陌生的（也有熟悉的）面孔，多是冰冷的、严厉的、凶悍的，偶尔碰到个温和些的，但却没有笑容。他们几乎都是命令式的，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更没有乞求的口吻，仿佛那都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地让他谈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让他交代他与他们的关系。先是说，说完了再写。问得最多的是关于他与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沈兼士、郑天挺、顾颉刚、俞平伯这些人的关系。那些校内校外的造反派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什么组织都来找他，气势汹汹地“勒令”他写交代材料，稍微客气一点的是让他写“证明材料”，算是“调查”。十年间，这样的事情几乎未曾中断过，有时，一天就来好几次，打发也打发不完。他感到很累、很烦，也很恼



火。尤其是诸如“你是怎样反对鲁迅的？鲁迅为什么写文章骂你？”“你同陈独秀联系过多少次？你参加了他的托派组织吗？”之类的提问，更使他怒火中烧，几乎按捺不住，但他终于忍住了，只有忍气吞声。他是个办事极为认真的人，让他办的事，他一定会勤勤恳恳地去干，绝不马虎从事。尽管又烦又累又恼火，他还是根据人家的提问，认认真真一笔一画逐条去写，并且用复写纸垫着，写成了一式两份，把原稿交给人家，把复写的那一份存留下来。久而久之，这样的“交代材料”和“证明材料”积攒了一大堆，几年下来，简直是充箱盈筐了。而今，他才忽然觉得，这些材料并没有白写，这就是他写回忆录的蓝本。他甚至惊喜地发现，这些材料，除去当时流行的诸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之类不得不说的套话和一些“认罪”之语，那内容全是如坚硬的骨头似的“干货”，既无不实之词，又不掺任何水分，这都是难得的史料。因此他说：“这些材料，很现成，无需费大力，就可以整理出。”

魏建功此时的思绪很是活跃，他又想起了一些别的事。他说：“病好了，我要带研究生。从去年起，中文系又开始招研究生了。系里早就让我带几名研究生，季镇淮先生同我商量过几次了，我都没有答应。想起这事，我心里很觉不安。这回，无论如何，我也要带几名。顾颉刚先生已经招研究生了……”

他想起了好多好多的事，他有些兴奋了，眼睛也亮了起来，叨念着：“不少老相识让我为他们写字，张中行，还有别的同事、朋友、学生，我欠下了许多债，病好了，一定要偿还……”

在去医院的路上，魏建功就这样不着边际地畅想着，甚至在默默地考虑着今后的工作计划。他希望自己的病很快好起来，去完成这些计划……

然而，他的病却没有医好。1980年2月18日，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三，在住进医院25天之后，国学大师魏建功因尿毒症病逝于北医附属第一医院，享年79岁。

天不假年，这是人生一大悲剧，也是人世间的一大憾事。

# 目 录

引言 /1

## 第一章 求学之路

一、西场少年 /1

二、南通灵才 /6

三、北大读书 /11

1. 投身新思潮的漩涡..... /12

2. 受业名师，勤学苦读..... /22

3. 钟情于歌谣与话剧..... /26

4. 站在时代的峰巅上..... /36

5. “解除婚约宣言”..... /45

6. “乙丑科状元”..... /51

## 第二章 学界新星

一、红楼内外 /59

二、汉城一年 /71

三、学界新星 /80

四、北海结社 /93



### 第三章 无限风光

- 一、投身国语运动 /98
- 二、《古音系研究》：古音韵学界的宏通之作 /102
- 三、深入探索北京话音系渊源 /106
- 四、纪念刘半农、白涤洲的几篇重要文章 /110
- 五、手书《鲁迅先生旧体诗存》长卷 /121

### 第四章 流离岁月

- 一、卢沟桥炮声响过之后 /124
- 二、从长沙临大到西南联大 /131
- 三、白沙五年 /145

### 第五章 台岛之旅

- 一、领衔赴台，推行国语 /165
- 二、创办《国语日报》 /174

### 第六章 重返红楼

- 一、迎接解放 /178
- 二、北大授课 /180
- 三、主编《新华字典》 /186

### 第七章 燕园春秋

- 一、在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 /194
- 二、致力于文字改革 /198
- 三、主持古典文献专业 /214

**第八章 “文革”遭际**

- 一、交代与“认罪” /224
- 二、修订《新华字典》 /228
- 三、受命充当“梁效”顾问 /232

**第九章 劫后余生**

- 一、再度受审查 /238
- 二、残年余热 /244
- 三、盖棺未论定 /248

**第十章 魏建功与现代文化名人**

- 一、魏建功与鲁迅 /253
- 二、魏建功与陈独秀 /261
- 三、魏建功与胡适 /273
- 四、魏建功与钱玄同 /278
- 五、魏建功与周作人 /293
- 六、魏建功与台静农 /299
- 七、魏建功与朱自清 /304
- 八、魏建功与罗常培 /307
- 九、魏建功与郑天挺 /311
- 十、魏建功与老舍 /314
- 十一、魏建功与顾颉刚 /318
- 十二、魏建功与刘半农 /323
- 十三、魏建功与陈济川 /326
- 十四、魏建功与侯宝林 /329



## 第十一章 魏建功身后事

- 一、“文革”中所写的交代材料成了珍贵的学术史料 /332  
二、藏书的归宿：万册遗书入藏华中理工大学 /333  
三、手书《鲁迅先生旧体诗存》失而复得和出版 /335  
四、《独后来堂十年诗存》题跋 /340  
五、《古音系研究》重新出版 /351  
六、《魏建功文集》的编辑与出版 /353  
七、《天行山鬼印蜕——魏建功印谱》面世 /356  
八、世纪初的学术盛会：纪念魏建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魏建功文集》  
出版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361

# 第一章

## 求学之路

### 一、西场少年

魏建功于1901年11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农历十月初十日）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赤岸乡西场镇（今属海安县）。西场镇在如皋城北三十华里。

如皋地处美丽富饶的江海平原，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如皋为苏北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产、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以及遍布全城的名胜古迹。为著名的江北鱼米之乡，素有“金如皋”之称。

这里也是人杰地灵的文化之乡，三国时为吴国开疆土的名将吕岱，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清代为慈禧诊治肠疾的儒医薛宝田等皆为如皋人，还有清代女才人石学仙、袁机、冒德娟、范贞仪、范姝、高繁、高槃、高蕴玉、石可仙、江秀琼诸人。城内外有唐宋道观灵威观、药王庙、斗母宫、吕祖殿、关帝庙、城隍庙、都天庙、火星庙；明清古桥迎春桥、玉带桥、众善桥、泰山桥、钱家桥、冒家桥、文德桥、武定桥、清海桥、三元桥、太平桥、丰乐桥、焦家桥、起凤桥、落凤桥、草行头桥、通江桥、望月桥、北苏家桥、永乐桥、百子桥、澄公桥、宏济桥、益人桥、虹彩桥、叹气桥、雁桥、德义桥、庆余桥、普济桥、拱极桥、裤子裆桥、通仓桥、余家桥、杭家桥、唐家桥；以及城隍庙、丰利文峰塔、中山钟楼等众多的名胜古迹；构成了荟萃着丰厚历史文化的人文景观。魏建功祖籍为江苏高淳县立信乡中堡村，清嘉庆年间，二十八世祖忠贵公为避战乱迁居如皋。曾祖孝德公经营花炮业，在西场镇开设了恒顺号杂货庄。祖父魏霖，字慰农，在回原籍高淳县试中考中秀



魏建功少年时代（左），坐者为魏母仲延康

才。他热心于公众事业，曾任西场董事 30 余载，又于 1905 年捐资，与李承标、仲统伊等以西场镇后街的玉皇宫四合式庙宇为校舍，创办了玉成公小学，为乡里所称道。他是堂董之一。父魏晋藩，字锡侯，一直在经营祖业。母仲延康。魏建功就生在这样一个小康之家，他是长子，其后，母亲又生下了二弟建章、三弟建邦、四弟建纲、妹建则。

1906 年，5 岁的魏建功进了西场玉成公小学。

1909 年，魏建功 8 岁时，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为他同李堡镇的吉姓之女订婚。这个举动当然也是源于十分钟爱这个天资聪颖的长孙的祖父慰农公。

这一切都是按当地古老的婚姻习俗来进行的。如皋是江北人文荟萃的古地，其习俗也就格外繁缛，极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古老的如皋婚俗，到了 20 世纪初年似乎还没有多少改变，“西学东渐”之风一点也没有吹拂到这个富庶之地。

婚姻的初步，是经人介绍后女家向男家发“口谕”。“口谕”是用草纸写的，上写“坤造行庚 × × 年 × × 月 × × 日 × 时生”，配以空白草纸一张以示成双，包在用两张见方红纸折成、四边有口的长方包内，包面写“全福”，由介绍人送至男家。男家接到